

通货膨胀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沈坤荣¹, 田 伟², 李子联¹

(1. 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2. 江苏省行政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4)

[摘要]当前我国物价水平仍然较高,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前几次通货膨胀有所类似。本次通货膨胀的原因也可归结为中国传统增长模式中常出现的“两难困境”,即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政府投资,银行信贷与货币的发放难以受到控制,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始终存在着高通货膨胀的风险,而高通货膨胀所带来的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反过来又挤压企业经营利润,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率。可以预计的是,在货币政策作用空间有限的背景下,此次通货膨胀的压力将持续一段时间。能否处理好总量和结构、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系,关键取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有机配合。

[关键词]通货膨胀;滞胀;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1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12)04-0088-09

总结我国六十多年的发展经验,经济的高速增长往往带来居民收入、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的提高,这些收入和利润的提高然后又进一步通过消费、投资和支出的渠道带动社会总需求的扩大,从而使物价指数面临上升的压力。因此,从需求的角度来看,通货膨胀与经济过热经常相伴相生。从供给的角度来看,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必然带来原料价格和工人工资水平的上升,这两个要素价格上涨造成的生产成本增加将进一步挤压企业的经营利润。高通货膨胀带来的企业经营利润下降一方面将极有可能带来产品的滞销;另一方面则使部分缺乏竞争力的企业面临经营困难和破产威胁。这两方面都将放缓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经济增长率,从而出现滞胀。从经济学经典理论和我国的发展实践可以总结出:高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往往难以同时实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常面临“政策的两难”。这一困境体现在我国近期的经济现实中则是:在物价水平攀高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放缓的迹象。这一信号对我们的启示在于:在治理通货膨胀及其预期的同时,更应防止经济放缓带来的风险。对于通货膨胀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研究,本文首先分析通货膨胀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其次从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的角度分析这一轮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最后分析通货膨胀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以及突破“两难困境”的相关举措。

一、通货膨胀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

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通货膨胀的衡量指标是经济学者度量通货膨胀的一贯做法。中国经济经历高速增长,但在增长过程中通货膨胀行态多样,本文把我国2007年以来物价的变动划分为三个

[收稿日期]2011-12-0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073076)

[作者简介]沈坤荣(1963—),男,江苏吴江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宏观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研究;田伟(1979—),男,江苏如皋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江苏行政学院讲师,从事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方面的研究;李子联(1985—),男,江西赣州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方面的研究。

阶段(见图1):第一阶段是2007年1月至2008年10月的物价高涨阶段。在这一阶段,受流动性过剩和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食品价格首先拉开上涨的序幕,之后物价指数上升幅度虽然略有小降,但仍然维持在105.6左右的平均水平,最高的为2008年2月的108.7^①。第二阶段为2008年11月至2010年4月的物价稳定阶段。在这一阶段,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我国物价指数出现了小幅的下降,如2009年2月至2009年10月,物价指数均处于100水平线以下。值得一提的是: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需求下降使得我国通货紧缩,从而出现价格稳定的局面;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为支持抗震救灾以及应对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向市场注入了大规模的流动性,抵消部分通货紧缩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表现为物价相对稳定的状况。第三阶段是2010年5月至今的通货膨胀预期形成及其攀升阶段。我国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虽然抵消了紧缩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也因其流动性规模过大而使市场形成了通货膨胀预期,并使物价指数上升的趋势进一步延续。这一趋势自2011年以来尤为明显,前8个月物价指数逐渐攀升,直到9月份才出现拐点,但仍维持在高位。这一趋势在消费者信心指数变化过程中也能得到验证:自2010年6月开始,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下跌,由当初的108.5下降到2011年2月的99.6,进一步表明我国通货膨胀压力在持续增大。值得一提的是,虽然2011年3月份以来消费者信心指数有较大回升,但之后几个月又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也说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发酵对我国宏观经济确实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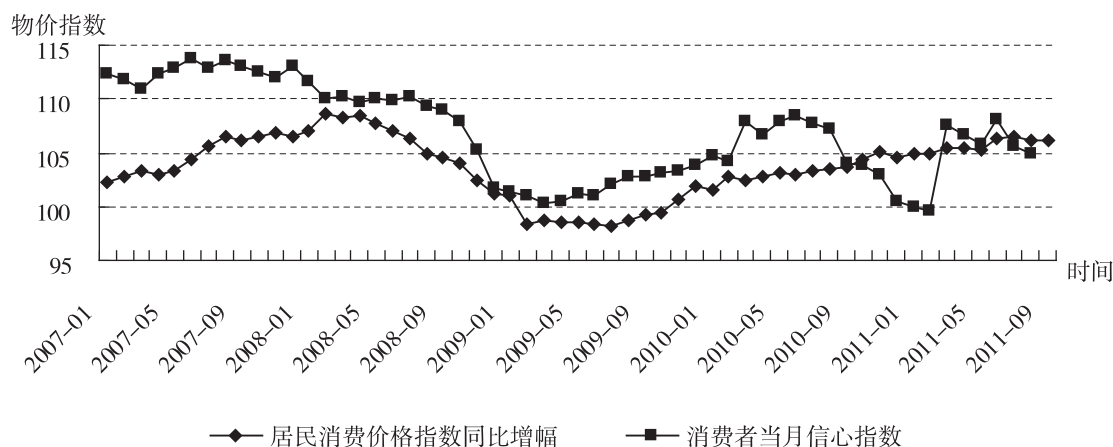


图1 2007年1月—2011年9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动态演变

与2007年及其之前所发生的几次通货膨胀相比,本次通货膨胀从根源上亦是货币和信贷过量投放的结果,它反映出投资需求过热的的问题以及在经济结构中存在着一系列深层次矛盾。然而,与前几轮通货膨胀不同,本次通货膨胀并非发生在经济过热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结构调整的阶段,这反映出经济调整过程中一系列成本上升因素对通货膨胀产生了影响。因此,本次通货膨胀所表现的增长特性也有所差异。比如: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对于通货膨胀的治理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对经济高速增长目标的实现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可能导致经济产生滞涨的风险。这一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已经开始出现放缓的迹象。

从工业增加值数据来看:2011年以来,我国工业增加值月度同比增长速度虽然并非处于历史低点,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则开始出现逐渐下降的迹象(见下页图2)。这一数据在2011年6月、7月、8月分别为15.1%、14%和13.5%,可见其增长幅度开始有所回落。另外,这些月份的工业增加值累积增长速度除了比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稍高以外,均低于其他年月的同一指标,如与2010年的相同月份相比,2011年仍分别有3.3、2.7和2.4个百分点的差距。这一数据表明,我国此轮通货膨胀下经济

^①以下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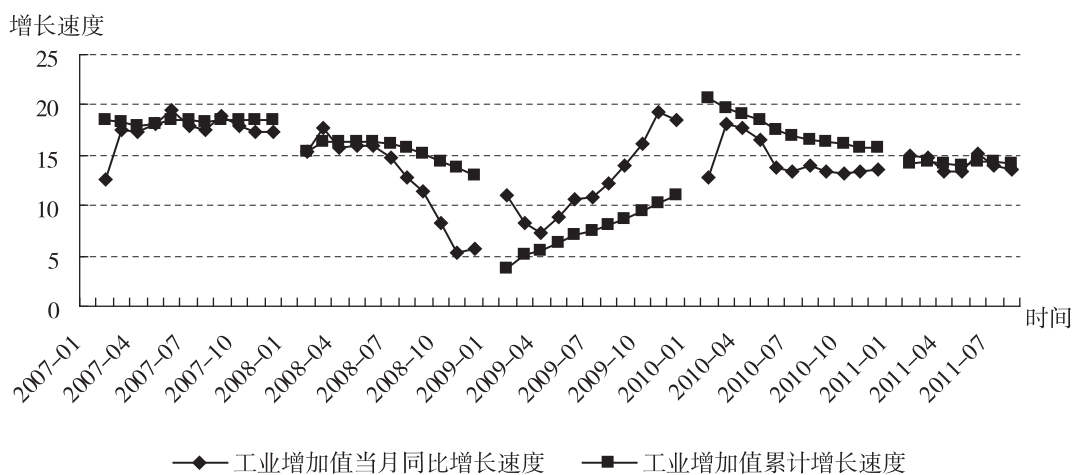


图2 2007年1月—2011年8月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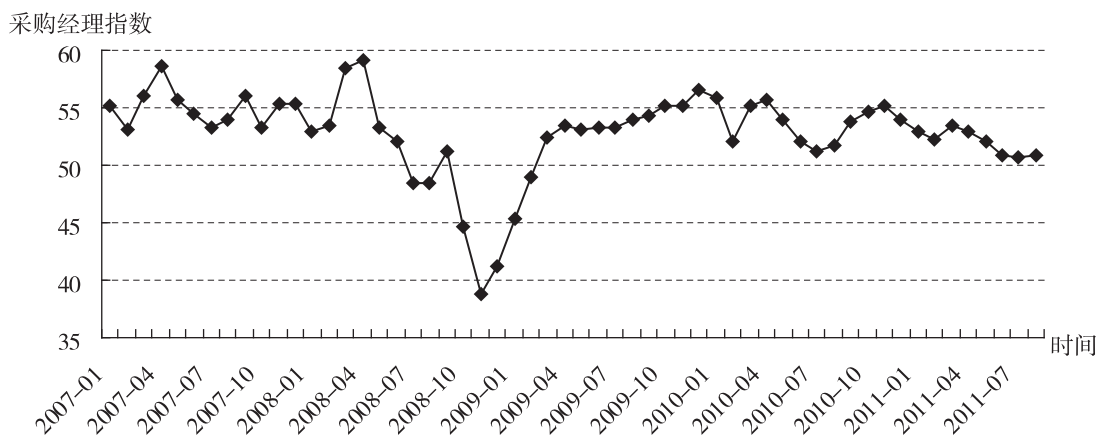


图3 2007年1月—2011年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增长确已有放缓的迹象,因此治通货膨胀,更要防滞涨。另外,从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来看,自2010年11月以来,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从55.2下降到2011年8月的50.9(见下页图3),这也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处在回调过程中。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高通货膨胀正在加剧高库存。数据显示^①:2011年3月末,全国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同比上升23.2%,增幅比上月末提高1.1%;这一库存积压现象在2011年4月并未好转,4月原材料库存指数达到52%,仅次于2010年1月的高位。相关数据还显示^②:截至2011年3月底,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账面存货金额已经高达3.53万亿元,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并创历史新高。通货膨胀预期所带来的存货规模的增长一方面占用较大的资金,从而拖累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导致不少企业的盈利预期下调;另一方面则给企业生产传递一种不准确的信号,使企业盲目地增加订单和追求开工率,这一过程一旦在需求放缓的情况下进行必将带来企业库存的调整,从而减缓经济的增长。

基于上述事实,一些机构和学者纷纷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进行了预测,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2012—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低于2011年9.59%的增长率,并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其预期值分别为9.52%和9.48%^③;李稻葵则认为由于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调控政策正在实施,因此2012年

①数据来源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方网站 <http://www.sdpc.gov.cn/>。

②数据来源于梁敏2011年5月7日在中国证券报发表的“热点数据下周公布:宏观经济面临双重挑战”。

③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 <http://www.imf.org/>。

GDP 增长速度的整体趋势是沿袭 2011 年的逐步放缓现状,估计为 8%—9% 的水平^①。虽然这些预测存在各自的差异,但都认为通货膨胀背景下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将逐渐放缓。

二、需求拉动与供给推动: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致发生过 5 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从根源上看,历次通货膨胀的发生都可归结为货币与信贷的过量投放,这与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相比并无特殊之处。本次通货膨胀的根源仍然在于货币供应量过剩。2009 年货币和信贷的过量发放以及经济转型过程中产业资本向产业外转移,是造成当前市场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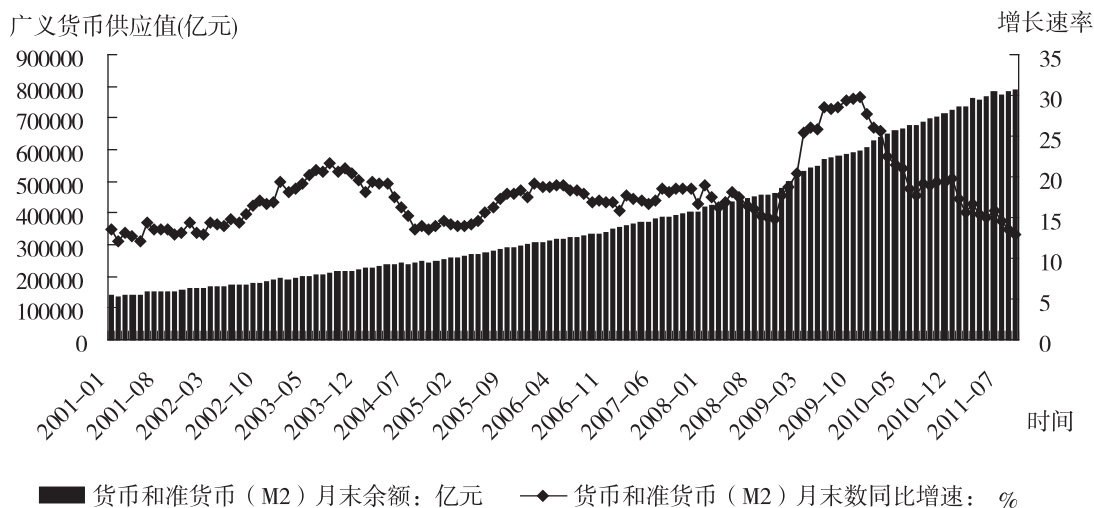


图 4 2007 年 1 月—2011 年 9 月广义货币供应量动态变化

图 4 中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动态变化表明:自 2007 年以来,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月末增长迅速,期间虽然增长幅度波动较大,但都维持在 15% 的底线以上;月末余额则由 2007 年 1 月的 35.15 万亿元增长到 2009 年 9 月的 78.74 万亿元。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市场对商品和资产的过剩需求,从而拉升价格水平,形成通货膨胀压力。值得一提的是,此轮通货膨胀中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并未快于以往增长速度。相关数据显示^②:2011 年 9 月我国新增贷款为 4700 亿元,与 2011 年 1 月份超过 1 万亿的新增贷款规模相比,9 月份贷款增幅较为平稳;2011 年广义货币余额 78.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比 2011 年 8 月末和 2010 年 9 月分别低 0.55% 和 5.96%。而之所以表现出价格高企的特征,极有可能是前几期货币投放过度带来了滞后效应,引发了通货膨胀预期进而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形成。这一市场信号也反映出企业存款的下降带来了银行新增存款的减少,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企业普遍存在着资金短缺的问题。

(一) 需求拉动与通货膨胀

从总需求角度来看,虽然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但引发各国货币超量发行的原因却各有差异。总体而言,引发我国货币超量发行的主要原因为各级政府持续旺盛的投资需求,但其背后隐含的则是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下存在的一系列结构性弊端。在传统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形成“高政府投资至高增长再至高通货膨胀压力”的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在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的作用下被不断强化,最终成为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发展的瓶颈。这一循环机制见下页图 5。

中国经济增长始终具有“高投资、低消费、高出口”的结构特征。就投资需求而言,高投资主要靠

^①资料来源于张璐 2011 年 5 月 11 日在齐鲁晚报发表的“李稻葵纵论宏观经济走向:年内利率或再调两三轮”。

^②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 <http://www.pbc.gov.cn/> 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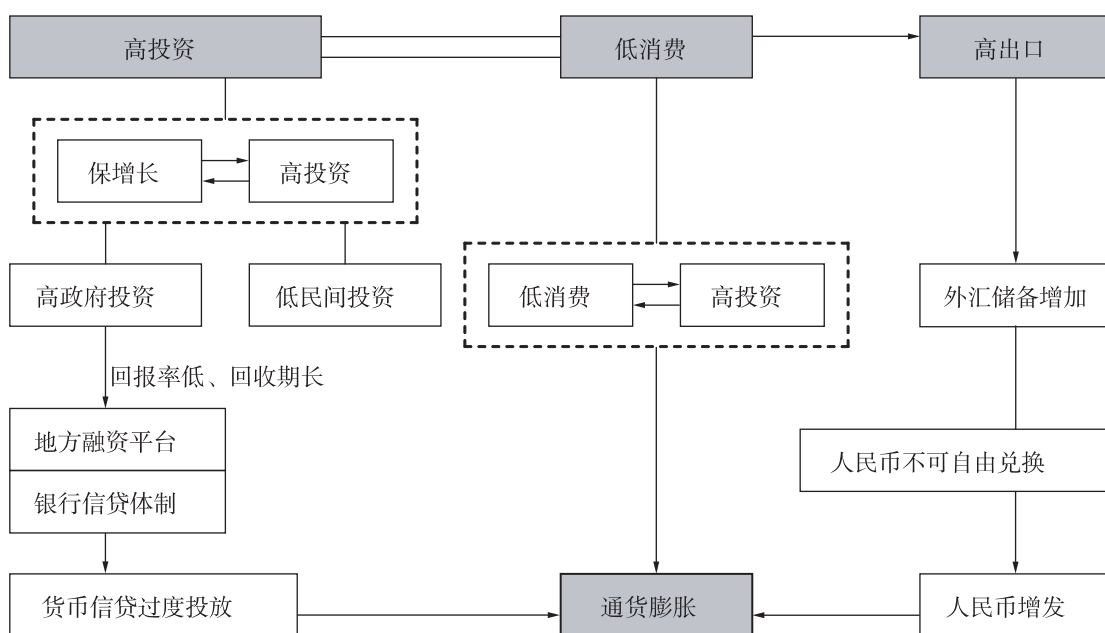


图5 需求结构与通货膨胀

政府投资支撑,民间投资相应不足。由于政府投资主要包括一系列垄断部门投资项目和地方政府投资项目,这对民间投资产生相当程度的“挤压效应”,从而形成了第一个“恶性循环”,即保增长与高政府投资之间的恶性循环。在政府投资的挤压作用下,民间投资始终难以启动,而为了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就不得不依靠政府投资规模和投资强度持续不断增加来拉动经济发展。政府投资项目的回报率一般较低、回收期较长,不过在地方融资平台、地方土地财政以及银行信贷体制的支持下,政府能够源源不断地追加后续投资,其结果虽然是维持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却导致了经济中货币与信贷的过度投放,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

首先,就本次通货膨胀而言,引发货币流动性过剩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2009年以来为防止经济衰退,中央采取了大规模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二是受经济危机的冲击,大量原先运转在产业内的民间产业资本由于传统产业的增速放缓以及改革等因素开始向外转移,然而由于部分垄断性行业没有放开,民间资本在没有找到合适产业出路之前,必然会寻找去实体化的出路,从而使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凸现。本次通货膨胀经历表明:经济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增长并进入调整和转型之后,传统的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将遭遇到瓶颈。

其次,就出口需求而言,政府投资所形成的产能过剩对出口及外汇市场也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由于政府投资主要按计划或规划开展,其规模和速度的扩张极易形成产能过剩的风险,在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下,为解决产能过剩,只有通过扩张出口以消化国内的过剩产能,不过该措施却导致了我国外汇储备的不断积累。在尚没有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必然促使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更多的人民币实现对冲,由此进一步增大通货膨胀的压力。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统计数据^①,截至2007年12月我国M2数值为403401.30亿元,同期外汇储备高达124825.18亿元,外汇占款导致基础货币投放量超过总货币供应量的30%。金融危机爆发后,因受外需萎缩的影响,外汇储备占货币供应量比重有所下降,但仍然居于高位,至2011年8月,外汇占款与M2的比值在26.78%左右(2011年8月M2数值为780852.3亿元,同期外汇储备为209093.56亿元)。

最后,就消费需求而言,以投资促增长的方式造成了收入分配结构的扭曲,并形成了“低消费—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 <http://www.pbc.gov.cn/>。

高投资”的恶性循环。一方面,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导致货币向资本所有者手中积聚,从而造成收入分配结构的扭曲,加上收入较高者的消费倾向较低,致使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积聚从而使得中国国内消费启动存在困难。另一方面,在“保增长—高政府投资”恶性循环的作用下,新增发的货币将进一步扭曲收入分配结构,加剧收入差距。通货膨胀压力强化了中国居民的“低消费、高储蓄”倾向,进而产生了内需不足的矛盾,形成“高投资—低消费”的恶性循环。

在上述一系列结构性恶性循环的作用下,中国难免会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产生高通货膨胀压力的风险。为实现经济“高增长、低通货膨胀”发展,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是一个必要的途径,通过更多地引导民间投资、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国内需求,克服种种恶性循环,从而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

(二) 供给推动与通货膨胀

就总供给方面来看,本次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成本推动型特征^[1]。通货膨胀受到原材料价格上涨和企业生产成本上升^①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

表 1 2011 年 2 月中国进口重点商品数量与金额增幅

商品名称	累计比去年同期			商品名称	累计比去年同期		
	数量	金额	均价		数量	金额	均价
鲜、干水果及坚果	8.0	29.5	19.91	木质胶合板	29.2	45.2	12.38
谷物及谷物粉	-27.4	0.9	38.98	纸浆	35.8	62.1	19.367
大豆	6.1	30.2	22.71	纸及纸板	-5.2	11.4	17.51
食用植物油	12.2	50.3	33.96	纺织用合成纤维	2.9	31.5	27.79
铁矿砂及其精矿	22.6	98.9	62.23	合成纤维纱线	0.7	23.7	22.84
原油	17.2	40.0	19.45	钢坯及粗锻件	46.3	75.7	20.10
成品油	31.7	48.8	12.98	钢材	7.0	21.0	13.08
肥料	-14.5	-4.5	11.70	未锻造的钢及钢材	-2.4	25.6	28.69
农药	-7.4	5.5	13.93	废铜	-0.6	26.0	26.76
初级形状的塑料	-0.5	16.3	16.88	氧化铝	-47.7	-38.0	18.55
ABS 树脂	1.8	23.8	21.61	未锻造的铝及铝材	-3.3	20.4	24.51
聚酯切片	-11.9	12.6	27.81	废铝	-13.9	5.3	22.30
天然橡胶	-14.2	50.5	75.41	金属加工机床	68.4	71.7	1.96
合成橡胶	-6.4	24.5	33.01	汽车和汽车底盘	47.3	53.6	4.28
原木	23.0	34.2	9.11	飞机	-20.8	34.6	69.95
锯材	58.1	65.7	4.81				

1. 全球通货膨胀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2007 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2]。为应对危机,各国政府普遍采用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连续实施两轮“量化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手段,在利率接近为零(0%至0.25%的基准利率空间)的情况下,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日本银行于 2008 年 10 月后连续降息,将政策利率下降至接近零的水平,并通过实施公开市场业务、超额存款准备金付息制度、购买长期国债等方式,连续向金融市场提供大规模流动性供给。在全球宽松货币政策及扩张财政政策的支持下,世界经济在 2009 年后开始恢复原先的增长趋势,但大规模流动性注入的后期效应也逐步显现,2010 年 7 月以来,全球商品价格尤其是原材料价格迅速走高,对中国的进口商品价格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截至 2012 年 2 月,绝大部分中国

^①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由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者工资水平提高、劳动保障条件改善、土地资源日益稀缺以及环境保护等因素造成。

重点进口商品的进口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均超过 15% (见表 1),国际通货膨胀通过商品(尤其是原材料)的进口传导到中国国内。

2. 用工成本的上升

当经济运行于潜在产出水平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如美国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通货膨胀周期就表现出一种“高通货膨胀—高薪资”的螺旋式上升形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享受了近 30 年的人口红利。然而,随着经济发展以及结构调整的深化,中国的人口红利也会逐渐消失,这样企业的用工成本上升便会形成通货膨胀压力。

进入 21 世纪,中国对于劳动条件的改善以及劳动者生活保障水平的提高给予了更多地关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2003 年年底通过的《最低工资规定》^①,对于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具体测算方法提出要求;2008 年通过的“新劳动法”(即 2008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做出了新的详细规定(如:将休息休假纳入劳动合同,促使用工时间的合法化;对于企业刻意隐瞒职业危害以及延长用人试用期等行为都进行了明确规定);2011 年 3 月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则明确要求在“十二五”期间,确保劳动者收入的增幅超过 GDP 增幅。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意味着中国如果要在 5 年内实现劳动者收入翻番,年平均工资上涨的幅度将在 15% 以上。这些都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成本产生影响,并将逐渐波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3. 资源环境“隐性成本”的公开化

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使得中国过去依靠廉价劳动力所构建的国际分工优势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的刚性约束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正成为企业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重要障碍。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 3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与之相伴随的是低工资、低社会保障以及高污染、高耗费。经济环境中的这一系列发展条件使得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可以被有效的“隐性化”(外部化),继而“化解”了成本推动价格上升的压力。但进入 21 世纪,当改善民生成为中央重大战略举措,当企业不再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土地以及能源,当环境成本开始被计入企业的预算约束时,企业长期的隐性成本便不得不公开化,并以通货膨胀的方式得到释放。

三、治通货膨胀,更要防滞涨

客观地说,从商品供求关系来看,当前价格上涨的压力并不是非常大。通货膨胀最主要的还是由货币超发、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和成本推动等因素引发的通货膨胀预期,这其中尤以房地产市场为甚,表现为仍有大量剩余资金在房地产市场逐利,因此未来通货膨胀预期依然强烈。供给的推动及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必然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带来严峻的挑战。因此,治理通货膨胀,尤其要治理通货膨胀预期,更要防止其所带来的经济下滑。这就要求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总量和结构以及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系,综合运用好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等多种价格和数量工具,消除通货膨胀的货币因素。

(一) 注重需求紧缩与供给扩张的双重作用并进一步调整好总量和结构的关系

与前几次通货膨胀相比,本次通货膨胀除受需求拉动外,供给(成本)推动也是引发通货膨胀持续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前所述,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制造”的成本不断上升,而社会稳定与改善民生要求又无疑会继续释放出经济转型中成本上升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成本推动可能成为中国未来几年通货膨胀压力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对于宏观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在成本推动成为驱动中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的背景下,仅仅依靠缩小总需求规模的紧缩性货币与财政

^①资料来源于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2/05/content_1300129.htm。

政策显然对于抑制供给成本的上升无能为力,相反却有可能使得企业“雪上加霜”^①,从而形成物价上涨和增长停滞的“滞涨”现象,如图6所示。

根据货币主义者的观点,治理通货膨胀应由货币政策发挥主要作用。然而,就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形势而言,仅仅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所能够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3]。首先,从加息来看,目前全球所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限制了中国的加息空间,在欧美等国利率接近于零的背景下,中国加息无疑会进一步扩大中美之间的利差,从而诱发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入,加剧我国的通货膨胀^[4]。其次,就存款准备金率而言,自2011年4月21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后,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已分别达到20.5%和17%的历史新高,中小金融机构信贷吃紧,货币政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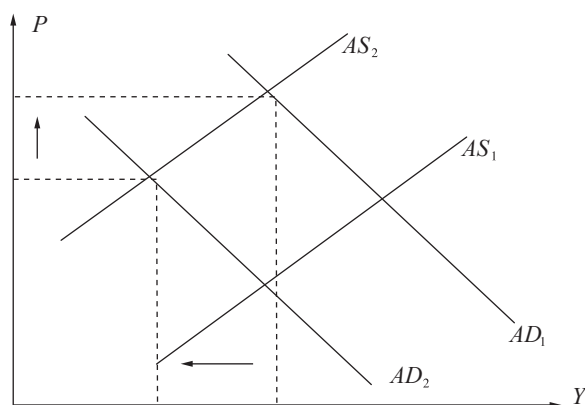


图2 供给推动型通货膨胀下需求紧缩政策与滞涨风险

空间日益缩小。面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虽然中国人民银行自2010年以来连续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性货币政策,但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的势头却未能得到明显的遏制。

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为应对滞涨,曾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策组合,将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进行有机结合。一方面,政府大幅提高利率,压缩银行信用,控制货币供应量;另一方面则实行减税、加速折旧和大量增加军费开支等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企业生产。里根政府成功应对滞涨的经验表明:为缓解需求推动与成本推动综合作用下的通货膨胀压力,有必要在利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压缩需求的同时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供给能力的提升。

因此,在政策措施方面,我们认为:为抑制当前的通货膨胀,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关键要协调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利用货币政策控制信贷规模,抑制流动性过剩,同时重视财政政策的供给调节作用,通过不断优化税收结构,加强企业自主创新,提高企业在面对实物要素刚性约束以及国际原材料价格上升压力下的生产供给能力,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的双重目标^[5]。具体而言,当前我国宜采取“稳健货币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1)实施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2)财政政策应逐步从总需求调节向总供给调节的方向转变。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对于总需求的扩张会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这虽然有利于平稳物价,但为了避免在紧缩货币的同时进一步恶化企业的生产条件,我们需要在利用好财政政策(未来几年,仍应适当利用扩展性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作用的同时,更多地重视财政政策的供给调节作用,改变传统的通过政府投资直接拉动总需求的模式,逐渐引导财政政策向提升社会总供给能力的方向转变。

(二) 注重财政政策的供给调节作用并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一个经济体的供给能力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知识资本以及制度等要素。因此,抑制供给推动型通货膨胀、预防滞涨的一个有效途径在于通过优化财政政策刺激上述要素的供给以达到提升经济体的供给能力。这些举措主要包括:第一,政府应通过优化税收结构以及引导财政更多地支持自主创新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保护型企业的发展,尤其应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改变粗放型企业受能源、土地以及环境等要素的刚性约束状况,通过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缓解因要素价格上升而带来的生产成本提高的压力。第二,不断加大财政对职业教育和技术人才培

^①事实上,为抑制通货膨胀,央行所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据国家工信部的统计数据,2012年年前两个月,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亏损面达15.8%,亏损额度增长率高达22.3%。

训的支持力度,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等,从而为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三,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农、惠农、强农政策,加大对“三农”的转移支付力度,减免农产品流通和加工环节的税费,保障食品供给安全。第四,为缓解由国际收支盈余增长过快引发的通货膨胀,政府可以在降低出口退税税率的同时对一些国内稀缺的生产要素加征出口关税,减少出口^[6]。另外,政府可以进一步削减进口关税,对企业进口给予补贴,从而扩大进口、减少贸易顺差。

在深化体制改革方面:一方面,为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信贷与货币超发的现象,政府必须优化需求驱动结构。就投资而言,政府应加快垄断性行业的改革步伐,使滞留于产业外的闲散资金重新回到产业内流转,积极引导民间投资,使政府行为逐渐淡化出投资领域;就消费而言,稳定消费预期,积极扩大内需,通过改善消费环境,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政府通过对投资和消费的调控,逐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从“高政府投资、低居民消费、高出口”格局向“以居民消费为主、民间投资有序推进”的良好格局转变。另一方面,不断改善政府治理水平,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一个有利的“软环境”。事实上,为解决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过程中所形成的成本推动压力,除了利用传统的要素支持外,还可以通过改善企业生存“软环境”,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等方式加以实现。

尽管根治通货膨胀从长期和短期来讲面临不少困难,但在我国稳定物价的过程中也具备许多有利因素,这些有利因素主要包括:国际原油和原材料价格有所下降;欧元区开始加息;美元区出现了收紧的迹象;外国热钱涌入的压力有所放缓;我国国内农产品的生产形势好转(中国粮食连续7年增产、库存充裕)。基于此,我国应把握国内外有利的宏观经济因素,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好总量和结构的关系,有效治理通货膨胀及其预期,从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 [1] 陈彦斌. 中国当前通货膨胀形成原因经验研究:2003—2007年[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2):16-22.
- [2] 艾哈迈德·艾尔·麦道依. 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1(6):3-9.
- [3] 张宇麟, 吕忠泽. 治理通货膨胀应该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J]. 当代财经,2008(11):34-38.
- [4] 何孝星, 黄雪霞. 继续实施上调利率的货币政策恐将有害无益——关于现行利率调控效果的反思[J]. 经济学动态,2008(4):50-53.
- [5] 沈立人. 对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考[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1(5):86-88.
- [6] 张龙, 白永秀. 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模拟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12):16-26.

[责任编辑:杨志辉]

China's Economic Growth under Inflation

SHEN Kunrong¹, TIAN Wei², LI Zilian¹

(1.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2. Jiang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Nanjing 210004, China)

Abstract: China's price indices begin to show a more substantial upward trend, its inflation pressure continues to grow. The inflation reflects China's traditional economic growth model has the "dilemma": for a long time,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s excessively dependent on government investment, making the issuance of bank credit and currency hard to control, while in high-growth economy there is always the risk of high inflation. In reverse, the increase of productive cost caused by inflation will not only extrude enterprise's profit, but also decrease economic growth rate. Because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is limited in the context of quantitative easing in USA, China's inflationary pressures will continue for some time. To effectively prevent the "stagflation" risk,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make its monetary policy and fiscal policy cooperate systematically.

Key Words: inflation; stagflation; monetary policy; fiscal policy; economic growth